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元分析：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视角

作者：韩志伟，程延园，任志帅，王丹阳，李国静

第一轮

编委 1 初审意见：

意见 1：文章中提到：卫旭华(2021)在对 Hunter 和 Schmidt(2004)与 Hedges 和 Olkin(1985)所提出的两种效应值整合策略进行比较后认为后者可能更加合理一些。请注意，卫旭华在书中的用词：或许更合理一些。图书一般未经同行评议，建议谨慎引用。

回应：感谢编委的宝贵意见。我们认同编委的意见并已在论文中将这一段引用删除。另外，Hunter 和 Schmidt(2004)的效应值整合策略在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元分析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如 JAP 中的大多数元分析研究均采用了 Hunter 和 Schmidt(2004)的效应值整合策略，因此本研究改用了 Hunter 和 Schmidt(2004)的效应值整合策略来重新估计元分析结果。详细修改请参见论文中 3.3 数据分析中的红色文字。

意见 2：在管理心理学领域不建议采用 CMA 进行元分析，原因有二：（1）方俊燕，张敏强认为：实证研究者应慎重采用内嵌 Wald-type z 检验方法的 CMA 软件；（2）CMA 是小众商用软件，完全可以用大众商用软件 spss 的宏文件，或者完全开源的 R 语言代替。如果作者一定要采用 CMA 软件进行元分析，建议提供 CMA 购买证明。

回应：感谢编委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使用基于 R 语言的 psychmeta 和 metafor 程序包重新进行了数据分析并报告了相应的分析结果。

意见 3：补充会议论文的检索；现在的文献检索日期到 2022 年 5 月，建议更新文献到 2022 年 9 月或 10 月。

回应：感谢编委的宝贵意见。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在文献检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对会议论文进行了检索，如中国知网、万方两个中文文献数据库均包括了会议论文检索的选项，Web of Science 和 Scopus 两个英文文献数据库亦包括了会议论文检索选项，但经过仔细审查发现这些会议论文要么已经被正式发表在期刊上，要么无法获取可用于元分析的有效数据（如只提

供了回归系数), 因此, 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没有包括会议论文。其次, 我们重新进行了文献检索。具体地, 我们对 2022 年 10 月检索的文献与 2022 年 5 月检索的文献进行了对比, 发现中文文献增加了 10 篇, 英文文献增加了 22 篇, 在对这些文献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筛选之后得到 5 篇可纳入元分析的文献, 并对这 5 篇文献按照相关原则进行了编码, 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数据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重新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 Yue(2022)发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上的论文与初次检索发现其发表在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上的论文为重复样本, 但两篇论文中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出入, 而其发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上的论文数据更为详实, 所以我们将这篇论文的数据纳入元分析, 而将第一次检索得到的其发表在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的数据作为重复样本处理。详细修改请参见 3.1 文献检索与筛选中的红色文字。(如编委或审稿专家需要, 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文献检索及筛选结果)

意见 4: 附录中补充相关测量工具的信度数据。

回应: 感谢编委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在附录的表格 1 中添加了 W_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相关测量工具的信度数据。

第二轮

非常感谢两位审稿专家! 我们根据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对研究进行了完善并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修改。首先, 我们重新进行了文献的检索、筛选和编码。在文献编码过程中, 我们尽可能全面地编码了可能的调节变量; 其次, 我们改用需求-资源视角来解释 W_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 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_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后, 我们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进行了更加详细和规范的报告。我们将在以下部分对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逐一的回应, 由于修改版论文相较于前版论文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写作, 因此我们不再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标注修改内容, 而是在每条回应后说明了对应的修改部分, 请审稿专家见谅。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理论贡献问题。作者提到理论贡献是对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问题的探讨, 因此通过元分析进一步明确, W_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的真实关系, 以及 W_ICTs 与工作-生活

冲突的真实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文献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贡献。但是，实际上后边的结果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在研究结论中作者提出的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均未得到验证，那么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又体现在哪里？目前作者在讨论中仅仅对分析了假设不成立的可能原因，并没有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如果作者认为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是个特别重要的理论视角，那么在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中的调节机制部分，作者也最好运用该理论的核心机制说明为何重点从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工作职位四个方面分析调节，众多调节变量为何选取人口学和工作特征进行元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1）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但初始研究未能充分地证明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前版论文的理论贡献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重新进行了文献的检索、筛选和编码工作，并在文献编码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编码了可能的调节变量。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所编码的 16 个变量中有 6 个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从而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完整的理论解释。

（2）我们在前版论文中试图将资源保存理论作为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但资源保存理论所涉及的核心命题只能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无法很好地解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了将其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我们改用需求-资源视角这一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如修改版论文所述“本研究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地，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短缺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工作-生活冲突)。此外，决定个体资源损耗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产生影响，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区)则会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理论模型见图 1)。”采用需求-资源视角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还可以合理地解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

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增强了论文的理论整体性。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第三段、2.3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和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中的影响因素。

意见 2: 研究设计问题。文章作者提到 W ICTs 的测量方式较为多样，测量工作也较为分散，然而后续的分析并没有针对此问题有所探讨。本文只选取了性别、婚否、职级以及是否有子女作为调节变量，同时这些调节变量也并未得到验证，为了增加贡献度并明确 W 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的真实关系，作者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调节变量，比如测量工具、研究设计(横断 vs.纵向)以及一些连续的调节变量（例如经济水平、年龄等）。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初始研究中所编码的调节变量确实较少，从而无法有效地证明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重新进行了文献的检索、筛选和编码工作，并在文献编码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编码了可能的调节变量。具体地，我们基于需求-资源视角对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国家或地区等 7 个变量的调节作用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调节效应检验。此外，我们还对文献发表状态、样本取样方式、研究设计、W ICTs 测量方式、员工年龄、员工组织任期、W ICTs 发生时间、W ICTs 发生地点和工作-生活冲突类型等 9 个变量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探索性的调节效应检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样本取样方式和 W ICTs 测量方式等 6 个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从而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完整的理论解释。具体修改请参见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中的影响因素和 4.3 假设检验。

意见 3: 作者重点对非工作时间和场所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与工作-生活冲突进行元分析，但非工作时间和场所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也会造成生活-工作冲突，而工作-生活冲突和生活-工作冲突是属于不同的概念，作者在检索文献、理论假设和元分析过程中是否加以区分？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文献检索过程中只使用了工作-生活冲突相关的检索关键词（如工作-家庭冲突），没有使用生活-工作冲突相关的检索关键词（如家庭-工作冲突）。由于相关文献可能并不会对工作-生活冲突相关的检索关键词进行方向上的区分，因而可能检索出 W ICTs 与生活-工作冲突的相关文献。因此，我们在文献筛选过程中依据工作-生活冲突的具体测量工具来判断相关文献是否符合纳入标准，并在修改版论文中的文献筛选部分以

脚注的形式进行了相应的说明。具体修改请参见 3.2 文献筛选中的脚注 6。在论文的理论部分，我们首先在引言中说明了本研究关注的是工作对生活的干扰（工作-生活冲突），并且在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部分也是严格基于工作-生活冲突这一概念进行的论述。

意见 4：文章的筛选流程图不是很详细。正文中既然提到了删除综述文献、质性研究文献、非中英文文献、重复样本文献、未测量工作-生活冲突文献和无法提取效应值文献这六种类型为文献，那么流程图应该分开报告，增加文章的可靠性，而不是只报告一个总数。此外，理论模型图不够美观，尤其是资源保存理论放在正中间，且箭头穿过其中。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1）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重新绘制了文献筛选流程图，并详细报告了每个阶段删除文献的原因和数量（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分开报告），以增强文献筛选过程的透明性和论文的可靠性。具体修改请参见 3.2 文献筛选。

（2）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重新绘制了需求-资源视角下的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图。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

意见 5：在假设检验部分建议作者画出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表格，增强文章的可视性。另外，在元分析程序里一般要报告 80%CV 的可信区间，但是在正文中没有见到这个值，请作者补充表格和相应的指标。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分别绘制了主效应和类别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以及连续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并在表格中详细报告了元分析研究通常所涉及的重要统计量（ k 、 N 、 \bar{r} 、 SD_r 、 SD_{res} 、 $\bar{\rho}$ 、 SD_{r_c} 、 SD_{ρ} 、95%CI、80%CV、 Q 、 I^2 等）。具体修改请参见 4.3 假设检验。

意见 6：论文写作上也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引言部分。一是引言部分对研究问题的分析不够明确和具体，应说明为何要对非工作时间和场所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进行元分析，找出本质研究问题。二是引言第三段略显突兀，与上述的衔接不够，并且没有说明为什么选取这四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1）关于某一研究主题存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但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存在一定的争议和矛盾，这是对此研究主题进行元分析研究的基础 (Lipsey & Wilson, 2001; Schmidt & Hunter, 2015; 姜铠丰, 胡佳, 2023; 罗胜强, 姜嫵, 2014; 卫旭华, 2021)。我们在前版论文中没有阐述清楚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导致研究问题的提出不够明确和具体。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首先说明了众多实证研究考察了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但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存在一定的争议和矛盾。具体阐述如下“由于 W ICTs 是一种发生在非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工作行为，因而其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关注(Schlachter et al., 2018)。然而，现有关于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例如，Butts et al., 2015; Ferguson et al., 2016; 马红宇 等, 2016)，亦有研究发现两者没有相关性(例如，Golden, 2012; van Zoonen et al., 2020; 张光磊 等, 2020)。”其次，我们强调了这些实证结果的矛盾和争议会对理论发展和管理实践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具体阐述如下“重要的是，这些实证结果的不一致导致目前无法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理论关系形成明确和完整的认识，进而会给组织和员工在管理 W ICTs 时带来一定的困惑。”最后，我们提出了本研究所关注的本质问题。具体阐述如下“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考察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第二段。

(2) 我们认为“引言第三段略显突兀，与上述的衔接不够”的原因在于前版论文中引言的第二段最后提出了本研究聚焦的研究问题，但引言的第三段开始却没有紧接着去论述如何解决上述研究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引言的第三段开始便论述了如何解决上述研究问题。具体阐述如下“本研究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随后，我们展开论述了如何解决上述研究问题。具体阐述如下“具体地，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短缺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工作-生活冲突)。此外，决定个体资源损耗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产生影响，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区)则会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理论模型见图 1)。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使用元分析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这使得段落之间前后呼应，论述逻辑也更为顺畅。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第三段。

(3) 我们认为“没有说明为什么选取这四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的原因在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核心命题并不适合解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提出的调节变量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即无法说明为什么要选取这些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为提出的调节变量提供了

较为合理的理论依据（即说明了为什么要选取这些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如修改版论文所述“此外，决定个体资源损耗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产生影响，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区)则会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理论模型见图 1)。”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第三段。

.....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围绕一个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主题进行了元分析。作为元分析类的文章，主要提出以下建议供修改时参考。

意见 1：关于元分析的视角有一点值得商榷，资源保存理论既能解释关系一致性原因，也能解释关系不一致的原因吗？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否充分，或者是否可以结合其他理论一起解释这种现象。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前版论文中试图将资源保存理论作为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但资源保存理论所涉及的核心命题只能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无法很好地解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了将其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我们整合了与需求和资源相关的理论（包括资源保存理论、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等），并提出了“需求-资源视角”这一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地，需求-资源视角中的“需求”同时包括工作角色需求和生活角色需求，“资源”则同时包括个体资源和外部资源。如修改版论文所述“本研究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地，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短缺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工作-生活冲突)。此外，决定个体资源损耗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产生影响，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

区)则会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理论模型见图 1)。”相应地,我们基于需求-资源视角对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新的论述。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第三段、2.3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和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中的影响因素。

意见 2: 对工作生活冲突有三个类别,时间、压力和行为。在资源保存理论下, W ICTs 对三者的影响是否差异? 相对影响程度是否不同? 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一个点。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重新对文献中的工作-生活冲突表现类型(时间工作-生活冲突、压力工作-生活冲突和行为工作生活冲突)进行了编码,并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W ICTs 与时间工作-生活冲突和压力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差异, W ICTs 与时间工作-生活冲突和行为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差异, W ICTs 与压力工作-生活冲突和行为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性没有显著性差异。此外,我们还对此研究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讨论。具体修改请参见 2.4.1 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的调节作用、4.3 假设检验和 5.1.2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中的影响因素。

意见 3: 从提出的四个调节变量看,按照.05 的标准,三个不支持,一个反向支持。可见,从解决不一致的角度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比如样本量,或原始研究提供笼统描述等,比如子女抚养,这个抚养原始研究并不一定真正测量了负担,有可能只报告子女数量,只是可能没有去读原始研究)前提下,作者在这点上实际上是失败的。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此条意见与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1 和意见 2 类似,即初始研究所编码的调节变量较少,从而无法有效地证明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已在对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1 和意见 2 的回应中进行了详细的回复,在此不再进行赘述,请审稿专家参见我们对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1 和意见 2 的回应。

意见 4: 根据文章最后的讨论,实际上理清楚不同信息和通信工具的 W ICTs、工作家庭冲突维度层次,这些更细微层面的整体关系及其差异对文献的贡献应该更大。可是,作者却忽视了这方面的调节影响,而是把它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重新对文献中的 W ICTs 使用工具(基于电话的 W ICTs、基于混合工具的 W ICTs)、工作-生活冲突类型(工作-生活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工作-休闲冲突)进行了编码。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W ICTs 使用工具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

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工作-生活冲突类型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具体修改请参见 2.4.2 W ICTs 使用工具的调节作用、2.4.8 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和 4.3 假设检验。

意见 5: 根据作者讨论部分的描述：“最后，本研究发现伴侣支持可能会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减轻生活角色需求对其能量资源的依赖，从而减轻 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的负面影响。因此，员工在实施 W ICTs 的过程中要注意借用其他外部资源(如家庭支持、经济资源等)来缓解 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的负面影响”。受此启发，作者在提出调节假设时是否可以从更高层次提，比如资源交换、社会支持（婚姻、伴侣）。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如前所述，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采用需求-资源视角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可能的调节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外部资源属于此理论框架中解释调节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时充分考虑了外部资源的作用。具体地，本研究中涉及外部资源的调节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国家或地区，因此我们在论述这三个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时充分探讨了相应外部资源的作用，以增强理论的完整性和严谨性。例如，在提出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时，我们既论述了婚姻会增加员工的生活角色需求，又探讨了婚姻会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帮助员工完成其生活角色需求，进而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具体修改请参见 2.4.5 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2.4.6 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和 2.4.7 国家或地区的调节作用。

意见 6: 在修改说明中指出用了新程序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并报告了相应的分析结果”，然而元分析文章一般都会以表格的方式报告多个数据，比如观察的效应值和校正的效应值，对应的标准误，方差解释量等。作者并没有报告这方面的详细的信息。既然所有计算过程均通过基于 R 语言的 psychmeta 和 metafor 程序包进行，应该提取这方面的信息制表。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分别绘制了主效应和类别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以及连续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并在表格中详细报告了元分析研究通常所涉及的重要统计量 (k 、 N 、 \bar{r} 、 SD_r 、 SD_{res} 、 $\bar{\rho}$ 、 SD_{r_c} 、 SD_{ρ} 、95%CI、80%CV、 Q 、 I^2 等)。具体修改请参见 4.3 假设检验。

意见 7: 与上面相关的一个问题，考虑测量工具信度和不考虑测量工具信度两类分析结果有多大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基于观察相关系数（不考虑测量工具信度）和信度校正后的相关系数（考虑测量工具信度）的元分析结果并无差异，两种分析结果均显示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样本取样方式和 W ICTs 测量方式等 6 个变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按照元分析研究的一般报告原则，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同时报告了观察相关系数的样本加权平均相关系数 (\bar{r}) 和信度校正后相关系数的样本加权平均相关系数 ($\bar{\rho}$)，但只报告了基于信度校正后相关系数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意见 8：文章指出：若研究按照参与者特征(如男/女)分别报告了相关系数，则按照不同的参与者特征将其当作独立样本进行编码，这种编码或处理是否有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由于马红宇等人(2016)将双职工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作为独立样本报告了相关系数和其他指标（如平均年龄），因此我们在文献编码时需要将其当作两个独立样本进行处理。例如，编码后男性独立样本中的男性比例为 1，女性独立样本中的男性比例为 0。

意见 9：则采用 Hunter 和 Schmidt(2004)提出的公式合成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系数进行编码，具体公式是什么？计算过程中是否考虑了信度？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详细报告了合并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中并不包含信度系数；合并相关系数所对应的变量信度使用 Mosier(1943)提出的合成公式计算合并后的信度系数。具体修改请参见 3.3 文献编码中的文献编码原则（5）和（6）。

意见 10：既然工作生活冲突有双向性，文章只研究一个方向，多大比例的文献报告了不同的测量方向的原始文献，这方面似乎交代一下更好。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虽然我们在文献筛选的过程中发现有 6 篇文献报告了 W ICTs 与生活-工作冲突的相关系数，但这 6 篇文献同时也报告了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并未将这 6 篇文献当作未测量工作-生活冲突的文献进行剔除，而是将其纳入最终的元分析文献，并在修改版论文中的文献筛选部分以脚注的形式对此情况进行了说明。具体修改请参见 3.2 文献筛选中的脚注 6。

意见 11：关于 W ICTs 的测量，有多种方式，最终进入元分析的文献中，各类测量工具使

用的频率是多少？类似的工作家庭冲突，测量工具也是多样化的。这两个方面相信作者应该也有编码。这部分建议放置论文中或附件中，这本身也是文献贡献。而且，基于这方面的还可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应理论部分或假设提出方面的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重新对文献中的 W 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测量工具进行了编码，W ICTs 的测量方式主要可以分为时长、频率和程度，并且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W ICTs 测量方式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 W 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的测量工具出处较为繁杂且无法归类，从而无法进行相应的调节效应检验。

意见 12：调节分析是 CMA 软件做的还是 R 程序做的？回归方程是什么，对应的系数是多少，也应该用表格形式呈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本研究的调节效应检验均通过 R 语言来实现，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详细阐述了类别变量和连续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以及相关的计算公式，并分别绘制了类别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和连续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具体修改请参见 3.4 分析策略和 4.3 假设检验。

意见 13：文献搜索中列举了多个中文和英文的检索词或组合。作者是直接把它置于论文正文，还是用注释的方式，哪样更好一些？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由于 W 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所涉及的中英文检索词较多，将其全部置于正文之中确实会使文献检索部分较为杂乱。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将 W ICTs 和工作-生活冲突所涉及的中英文检索词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在附录中。具体修改请参见 3.1 文献检索和附录表 1。

意见 14：假设检验第二段：缺第三点，直接从 2 跳到 4。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并对全文的编号进行了自查，以保证论述的条理性。

意见 15：元分析自检报告与修改版本有出入时，是否应该应修改元分析自检报告，比如元分析软方面。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心理科学进展》投稿指南中的“修改稿要求”规定“每次修改稿都不要有作者的有关信息，保留投稿时填写的论文自检报告。”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没

有修改元分析自检报告。

额外回应：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审稿专家，并非常认同两位审稿专家对初始研究和前版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在认真阅读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之后发现初始研究和前版论文确实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向编辑部提交了延期交稿的申请。在整个研究和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几乎将初始研究和前版论文全部推翻并重新来过，除了针对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具体的修改之外，我们还对一些研究细节和论文写作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完善，以至于延期较长才完成修改，希望两位审稿专家见谅。虽然我们对研究和论文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完善，但仍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希望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继续进行修改和完善。另外，我们已将 Excel 格式的文献编码表发送至编辑部，请审稿专家查阅。

参考文献

- 姜铠丰, 胡佳. (2023). 元分析研究法. 见 陈晓萍, 沈伟 (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4th ed., pp. 323-342).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胜强, 姜嫄. (2014). *管理学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重庆大学出版社.
-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2016). 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知: 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分析. *心理学报*, 48(1), 48-58.
- 卫旭华. (2021).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元分析方法*. 科学出版社.
- Lipsey, M. W., & Wilson, D. B. (2001). *Practical meta-analysis*. Sage.
- Mosier, C. I. (1943). On the reliability of a weighted composite. *Psychometrika*, 8(3), 161-168.
- Schmidt, F. L., & Hunter, J. E. (2015).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 (3rd ed.). Sage.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之前提出的意见已经基本得到回应，并在论文里进行了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您的宝贵意见对于研究的完善和论文的修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再次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

.....

审稿人 2 意见：

修改稿通过整合现有理论，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文章的整体感。但是，文章还存在一些具体需要完善的地方。

意见 1：需求-资源理论的来源，需要交代一下，比如它是多个理论的整合而来。同时，还需要在整体上再强调这是一个基于某中介的一个核心理论，它的优势是什么，相对于以往更能解释什么。最好在理论基础部分增加这方面的论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您的意见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本研究整体理论逻辑，并思考了“需求-资源视角”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具体地，本研究的主效应理论逻辑是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即“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冲突形成过程)”。基于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我们提出了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即“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会通过员工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不同来影响个体资源损耗过程；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会通过员工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则会通过员工外部资源满足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从而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本研究整体理论逻辑。本研究的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自于需求和资源相关理论（包括资源保存理论、工作-需求资源理论、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核心观点和命题，但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来自于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因此，前版论文中关于本研究整体理论逻辑的阐述（本研究基于需求-资源视角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以及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不准确。此外，我们重新深入阅读了需求和资源相关理论（包括资源保存理论、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经典文献和最新综述文献(Bakker & Demerouti, 2017; Bakker et al., 2023; Hobfoll et al., 2018;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廖化化 等, 2022; 王震 等, 2021)，并发现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便可以为调节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具体地，ten Brummelhuis 和 Bakker(2012)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提出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该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工作或生活领域的需求和资源如何通过个体资源的变化来影响生活或工作领域的结果(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王震 等, 2021)，其核心命题之一便是“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无法有效地完成生活角色需求(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这就为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

性理论模型)提供了合理且有利的理论依据。因此,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改用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引言部分重新阐述了本研究的整体理论逻辑,即“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王震 等, 2021)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识别了此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地, 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冲突形成过程)。基于此理论逻辑,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通过员工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不同来影响个体资源损耗过程;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会通过员工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则会通过员工外部资源满足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从而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产生影响(整体的理论模型见图 1)。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使用元分析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蓝色文字。

意见 2: 引言中提到:“进而会给组织和员工在管理 W ICTs 时带来一定的困惑”,哪些困惑,应该更为具体一点,或者至少运用举例方式说明一下。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前版论文关于实证结果的不一致对管理实践造成不利影响的阐述确实比较含糊,我们仅仅阐述了“会给组织和员工在管理 W ICTs 时带来一定的困惑”,但并未进一步具体说明会带来哪些“困惑”。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举例阐述了最为典型和重要的一种“困惑”,即“组织和员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缓解 W ICTs 可能引发的工作-生活冲突”。同时,这一举例也与后面的 5.2 实践启示形成了前后呼应,进一步增强了论文的整体性。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第二段的红色文字。

意见 3: 假设 1 的提出感觉有些别扭。分别提出 W ICTs 对三个维度有影响。最后,在缺乏任何过渡前提下,比较突然的提出假设 1: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具有正相关关系。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前版论文中假设 1 的提出确实比较突兀,我们分别阐述了 W ICTs 与时间、压力和行为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但并未进行相应的总结便提出了“假设 1: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具有正相关关系”。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总结性阐述并进而提出了研究假设 1,即“综上所述, W ICTs 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非工作时间资源、心理

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非工作时间匮乏、心理压力),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引发工作-生活冲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时,这一总结性阐述也与前面提出的理论模型形成了呼应,进一步增强了论文的整体性。具体修改请参见 2.3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中的红色文字。

意见 4: “决定个体资源损耗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产生影响,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国家或地区)则会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这里,对冲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有两类因素,而变量却有些重合(比如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容易引起混乱。包括下文在阐述具体的调节效应产生原因时,讲到一个变量,同属于两类因素,究竟是什么影响的?最好有比较强的理由。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基于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确定的,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首先在 1 引言中提出了婚姻状况和子女抚养状况同时属于“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随后在 2.4.5 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和 2.4.6 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婚姻状况和子女抚养状况同时属于“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2.4.5 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和 2.4.6 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中的蓝色文字。

意见 5: 理论框架和假设的结合度不明显。感觉假设部分几乎很少用到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如前所述,前版论文中的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来自于需求和资源相关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命题,但我们并未具体说明相应的核心观点和命题,从而导致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缺少具体的理论依据。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首先阐明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相关命题,即“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如时间资源、情绪资源和认知资源等)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无法有效地完成生活角色需求(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王震 等, 2021)”,随后基于此命题详细论述了 W ICTs 如何通过个体资源短缺引发工作-生活冲突,从而为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具体修改请参见 2.3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中的蓝色文字。

此外,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来自于主效应理论逻辑(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即“决定

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会通过员工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不同来影响个体资源损耗过程；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会通过员工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则会通过员工外部资源满足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来影响冲突形成过程，从而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产生影响”，我们基于此理论逻辑确定了不同的影响因素并详细论述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对不同因素调节作用的论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从而使其更加贴合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具体修改请参见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影响因素中的蓝色文字。

意见 6: 调节变量的假设部分有些凌乱，研究假设和问题交替进行，最后加上一些探索性的调节变量，这种安排和表述似乎不是最优的。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需要澄清的是，前版论文中不同调节变量的提出顺序是按照调节效应的理论逻辑来安排的。具体地，我们首先对“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其次对“只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性别）提出了相应的研究问题，再次对“同时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最后对“只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基于我们有限的经验，顶级期刊的元分析研究大都按照理论逻辑来安排不同调节变量的提出顺序，并不管调节作用是以研究假设、竞争性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的形式来呈现。相反地，如果按照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来安排不同调节变量的提出顺序反而会破坏论文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保留了前版论文中不同调节变量的提出顺序，请审稿专家明鉴。

意见 7: 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个更表象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似乎更为深层次一些。因此调节变量的提炼并切入到关键点很重要，让人直觉上感到它可能重要。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前版论文关于国家或地区的调节作用的阐述确实存在偏颇，我们关注的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但并未准确地使用相应的变量名称。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将“国家或地区”明确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并在全文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例如，我们将 2.4.7 国家或地区的调节作用修改为 2.4.7 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

意见 8: 文章中有两类工作生活冲突，一种分类是强调工作与家庭、休闲和生活的冲突。另

一类是工作生活冲突的具体维度，比如时间，压力和行为基础的。这两类概念是否可以讲得更清晰一些，比如分析时是否可以把他们放到临近的位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工作-生活冲突的类型（工作-生活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工作-休闲冲突）和工作-生活冲突的表现形式（时间工作-生活冲突、压力工作-生活冲突、行为工作-生活冲突）两类概念确实容易引起读者的混淆，我们在 2.2 工作-生活冲突的定义与测量中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并在修改稿中将工作-生活冲突类型和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安排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的临近位置，从而方便读者进行查阅。具体修改请参见表 1 主效应和类别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中的**红色文字**。

意见 9：表述上：“这会损耗员工的认知资源和情绪资源等心理资源，从而引发心理压力”，同一自然段，出现三次几乎相同的论述。这个可以设法避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需要澄清的是，前版论文关于 W_ICTs 损耗员工心理资源从而引发心理压力的三次论述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具体地，我们详细阐述了 W_ICTs 会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机制）损耗员工的心理资源从而引发心理压力。例如，W_ICTs 本身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心理资源从而引发心理压力（论述一），W_ICTs 意味着违反了正常的社会规范，这会引发员工的愤怒情绪，愤怒情绪会损耗员工的心理资源从而引发心理压力（论述三）。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保留了前版论文关于此部分的论述，请审稿专家明鉴。

意见 10：实践启示方面：从平衡的角度讨论似乎更合理，比如 W_ICTs 虽然对组织有益，但是对个人的某些方面，或对员工却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W_ICTs 的“双刃剑”效应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Đuranová & Ohly, 2016; Schlachter et al., 2018; 程欢 等, 2023; 叶萌 等, 2018)。需要澄清的是，本研究聚焦于“W_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这一更加具体的研究主题，并根据元分析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缓解 W_ICTs 所引发的工作-生活冲突”的具体措施。相反地，如果我们从更加整体和平衡的角度讨论关于 W_ICTs 的实践启示反而会失去针对性并破坏论文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保留了前版论文关于此部分的表述，请审稿专家明鉴。

意见 11：讨论和局限部分的太窄。让人感觉三个观点都是样本量的问题。其他的一些局限和延伸问题也应该提及。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前版论文关于局限和展望的阐述确实较为狭窄，我们仅仅讨论了“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这一具体研究主题的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展望，但并未就“W ICTs”这一研究主题的局限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展望。事实上，虽然本研究聚焦于“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这一具体研究主题，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W ICTs”这一研究主题存在诸多局限。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分别讨论了“W ICTs”这一研究主题在实证、方法和理论方面存在的主要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展望。同时，为了不影响论文的整体性（与5.3 研究主题的局限与展望区别开来），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单独的阐述。具体修改请参见 5.4W ICTs 的局限与展望。

额外回应：我们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您的宝贵意见促使我们重新理清和完善了论文的理论逻辑，从而增强了论文在理论上的严谨性。此外，我们还对论文整体进行了更加仔细的审阅，并补充和完善了一些具体内容，具体修改请参见修改版论文中的绿色文字。

参考文献

- Bakker, A. B., & Demerouti, E. (2017). 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forward.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2*(3), 273-285.
- Bakker, A. B., Demerouti, E., & Sanz-Vergel, A. (2023). 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Ten years later.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0*, 25-53.
- Đuranová, L., & Ohly, S. (2016). *Persistent work-related technology use, recovery and well-being processes: Focus on supplemental work after hours*: Springer.
- Hobfoll, S. E., Halbesleben, J., Neveu, J. P., & Westman, M. (2018).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The rea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 103-128.
- Schlachter, S., McDowall, A., Cropley, M., & Inceoglu, I. (2018). Voluntary work-related technology use during non-work time: A narrative synthe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4), 825-846.
- ten Brummelhuis, L. L., & Bakker, A. B. (2012). A resource perspective on the work-home interface: The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7), 545-556.
- 程欢, 陈丝璐, 郭凯莉. (2023). 非工作时间与工作相关电子沟通的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40*(1), 6-20.

廖化化, 黄蕾, 胡斌. (2022). 资源保存理论在组织行为学中的应用: 演变与挑战. *心理科学进展*, 30(2), 449-463.

王震, 陈子媚, 宋萌. (2021). 工作、家庭难兼顾?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11), 58-79.

叶萌, 唐汉瑛, 谢菊兰, 马红宇, 岳闪闪. (2018). 非工作时间使用通信技术处理工作的“双刃剑”效应及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 41(1), 160-166.

第四轮

审稿人 2 意见:

尽管作者在前一版基础上做出了一些修改, 也明显提高了论文的质量, 但是审稿人还想提以下细节性问题, 供作者修改时参考。

意见 1: 文章最终选取了一个理论作为解释框架, 并重点突出了两个阶段。其实, 根据论文所交代, 原理论实际上也暗含了两层意思 (资源损耗和无法满足需求进而引发不协调), 如何体现在一个理论(已存在的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作者声称的理论, 比如摘要所陈述)模型。比较两者的差异, 感觉更多的是细化和阶段化, 而不是提出了一个理论。另外, 作为一篇量化性综述文章, 至少可以交代一下, 原始实证文章在做研究时主要选取了哪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而本研究采用的是更高阶的理论对它们进行的整合。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1) 需要澄清的是, 本研究所提出的“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是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核心命题 (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 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无法有效地完成生活角色需求) 在变量层面的具体化, 即 W ICTs 会导致员工个体资源短缺 (非工作时间匮乏、工作压力) 并进而引发工作-生活冲突, 并非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提出的“新理论”。我们认为可能是论文的相关表述 (如“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以解释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 不够严谨, 从而导致审稿专家产生了上述疑问。因此, 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对相关表述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从而保证论文的理论严谨性。具体修改请参见摘要和 1 引言中的蓝色文字。

(2) 需求和资源相关理论 (如资源保存理论、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是相关实证研究应用最多的理论,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属于其中一个具体的理论而非“更高阶的理论”。如果在论文中将这理论统统介绍一遍非不会对论文产生额外的价值, 反而

会使论文逻辑混乱且臃肿。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没有添加相关论述，请审稿专家明鉴。

意见 2: 文章中有“即个体资源短缺并不会引发行为工作-生活冲突”的论述，那为什么要把作为一个方面放入假设 1（根据前后文，假设 1 中的工作生活冲突应该包括时间、压力和行为三个方面）？而且，后文在假设 2 中，继续验证 W ICTs 对三类工作生活冲突（时间、压力和行为）影响的差异。逻辑上需要进一步理顺。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前版论文关于 W ICTs 影响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论述确实存在问题，从而导致相关研究假设的提出不够顺畅。具体地，我们只考虑了个体资源短缺（非工作时间匮乏、工作压力）不会直接引发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如前版论文所述“个体资源短缺与行为工作-生活冲突无直接的理论相关性”），却忽略了个体资源短缺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引发行为工作-生活冲突。我们深入阅读了相关文献并认为工作压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引发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具体地，元分析证据显示工作压力会抑制员工的心理脱离 (Bennett et al., 2018)，因此，工作压力会使员工在 W ICTs 结束后无法及时从工作心理和行为模式中脱离出来，从而导致工作行为模式延伸至员工的生活角色使其无法有效地完成生活角色需求(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基于此，我们对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和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论述。具体修改请参见 2.3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和 2.4.1 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的调节作用中的红色文字。

意见 3: 根据论文阐述，以及对审稿人的意见回复可以看出，论文拟回应三种形式的问题：研究假设类，竞争性假设类和探索类。根据作者的回复，前两类问题（假设类和竞争性假设类）似乎是划归为有理论基础的，但是从作者的阐述看，对竞争性假设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比如研究问题 1 的阐述中有“因此在理论层面无法推断管理人员的 W ICTs 和普通员工的 W ICTs 对个体资源短缺的影响是否不同”的论述）。既然已经有研究实证和分析了它们之间关系存在的条件，元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进一步验证此条件是否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又回到问题的起点。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需要澄清的是，本研究拟考察两类变量的调节作用，一类是符合调节效应理论逻辑的变量，另一类是不符合调节效应理论逻辑的变量。对于符合调节效应理论逻辑的变量，变量的调节作用呈现形式（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是进行理论推导之后确定的。具体地，变量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推导之后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则采用研究假设的形式来呈现（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的调节作用、W ICTs 使用工具的调节作用、婚姻状况的调节

作用、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 变量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推导之后存在两种或多种可能性则采用研究问题的形式来呈现(工作职位的调节作用、性别的调节作用、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对于不符合调节效应理论逻辑的变量(如方法类变量), 我们则不进行理论阐述而直接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 当理论上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时可以采用“竞争性研究假设”作为呈现形式, 否则需要使用“研究问题”作为呈现形式(例如, Liao et al., 2022)。在本研究中, 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存在两种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 工作职位的调节作用和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则存在多种可能性, 因此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均采用研究问题的形式来呈现。因此, 我们未对 2.4.3 工作职位的调节作用、2.4.4 性别的调节作用和 2.4.6 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的论述进行改动, 请审稿专家明鉴。

意见 4: 理论模型(图 1)中, 文章没有测量“个体资源短缺”变量, 更没有以它为中介变量进行元分析, 因此把它作为跟其他变量(前因、后果和调节)并列设置并不合适。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个体资源短缺”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虽然我们没有对其中介效应进行元分析, 但将其放置于理论模型(图 1)中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 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的影响过程, 以及调节变量如何影响 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关系。因此, 我们将理论模型(图 1)的“个体资源短缺”设置为虚线框以示区别。此外, 我们在第二轮修改过程中曾考虑过中介效应元分析, 但绝大部分实证研究未对“个体资源短缺”的相关变量进行测量, 因此无法对“个体资源短缺”的中介效应进行元分析。

意见 5: 文章先分类出“基于手机和电脑”两个方式的通讯工具使用, 然后突然提到综合工具的使用(尽管有脚注)。继而, 在研究结果和讨论中沿用了综合工具使用。然而在文章的局限与展望部分又提到基于手机和电脑这两种分类模式。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述需要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将“基于电话的 W ICTs 和基于电脑的 W ICTs 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角色需求并会对个体资源产生不同的损耗效应”修改为“基于电话的 W ICTs 和基于混合工具(包括电脑和电话)的 W ICTs 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角色需求并会对个体资源产生不同的损耗效应”, 并通过脚注的形式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分类, 从而保证了此部分内容在理论假设、实证检验和贡献讨论中的一致性。此外, 由于“W ICTs 主要基于电话(包括固定电话、手机、智能手机等)和电脑(包括固定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两类工具来进行, 且基于不同类型工具的 W ICTs 往往聚焦于不同形式的工作任务”是后续论述的基础, 因此我们未对此论述进行改动。具体修改请参见

2.4.2W ICTs 使用工具的调节作用中的紫色文字。

意见 6: 根据论文阐述和实证分析结果，已婚类比未婚类，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的影响要弱一些。不抚养子女的个体既可能处于已婚状态也可能处于未婚状态。那么是否由此可以推断，不抚养子女的未婚类 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影响最强？文章是否可以进一步做此分析？带着以上疑问，看了文章的数据（表 2），发现抚养子女比例越高，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影响越弱（ $b = -0.28$ ）。言外之意是：越不抚养子女，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的影响越强。这里是否也暗含着：不抚养子女的未婚类 W ICTs 对工作生活冲突影响最强。因为这里不抚养子女包括已婚和未婚状态。综合起来，作者是否可以进一步做一些类似的更深入的分析（仅供参考）。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从本研究的调节效应理论逻辑和实证结果上来看确实可能存在审稿专家提出的这种情况，但本研究的数据结构使我们无法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具体地，现有实证研究大都采用方便取样并报告了样本的已婚比例和抚养子女比例，少有实证研究完全按照已婚（未婚）和抚养子女（不抚养子女）的情况进行选择取样（如只选择已婚员工作为样本或只选择抚养子女的员工作为样本）。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无法对审稿专家提出的这种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我们在修改版论文中没有进行相应的分析。

意见 7: 两类因素的归类不清晰。比如，婚姻状况究竟是内在要求因素还是外在支持因素，或者是混合因素。如果是混合因素，理论上至少应该单独作为一类进行检验。否则很容易遭受质疑。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混淆，我们首先在 1 引言中说明了婚姻状况和子女抚养状况同时属于“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因素”和“决定外部资源多少的因素”，随后在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影响因素中进一步强调了婚姻状况和子女抚养状况同时属于“两种因素”。具体修改请参见 2.4W ICTs 与工作-生活冲突关系的影响因素中的绿色文字。

意见 8: 摘要中说：“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性理论模型……”，过程性理论模型并没有超脱“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在文章中声称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不严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这个问题我们已在 1、理论或假设方面的问题的意见 1 回应中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请审稿专家参见上述回应。

意见 9：文章开头用三个片段新闻，感觉并不严谨也没有必要。仅供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论文开头的三篇新闻稿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确实不强。因此，我们已在修改版论文中将这三篇新闻稿删除。

参考文献

Bennett, A. A., Bakker, A. B., & Field, J. G. (2018). Recovery from work-related effor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9(3), 262-275.

Liao, H., Su, R., Ptashnik, T., & Nielsen, J. (2022). Feeling good, doing good, and getting ahead: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at 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3-4), 158-198.

第五轮

编委 1 意见：

意见 1：论文经过多轮评审和修改，已经达到本刊的录用要求，建议录用。

.....

编委 2 意见：

关于“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元分析：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视角”一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优化。具体意见和建议如下：

意见 1：标题。（1）“非工作场所”是否需要在标题和正文中被强调或限定？与“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以下简称 a 情境处理工作）对应的是“非工作时间和在工作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以下简称 b 情境处理工作）。从日常生活中看，有多少人在 b 情境处理工作？从文献看，参与到本文元分析的文献有多少将 b 情境处理工作单独列出来？这些将 b 情境处理工作单独列出来的文献是否值得作为一类单独出现？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可以直接将工作场所去掉？编委以“location”做关键词搜索本文参考文献，在标题中没有关于工作场所的表述。（2）“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的表述。作者在脚注中也提到，有关这一现象的表述很多。在不引起歧义的前提下，建议用前人已经用过、且简单的表述更为合理。比如，“非工作时间的的工作连通行”是否更为简洁？（3）从标题字数来看，现在的标题已经远超建议的数量。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本研究关注的是“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文献纳入也自然地包括“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场所”两个基本条件（基于具体的测量而非名称判断是否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因此，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并不涉及“非工作时间和在工作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实际上也没有研究关注于此）。但诚如编委老师所言，使用“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作为“在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的名称确实不够简洁。因此，我们使用“工作连通行为”来指代上述行为。具体地，第一篇中文综述文献(袁硕, 唐贵瑶, 2018)和诸多中文实证文献(龚朔 等, 2024; 马丽, 马可逸, 2021; 聂琦 等, 2021)均采用了此名称，并且此名称暗含了“发生在非工作时间”、“发生在非工作场所”和“借助相应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等行为特征，可以更为简洁地指代上述行为。修改后的标题变为“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生活冲突的元分析：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视角”。

意见 2：关于 W ICTs 的含义。编委简单 scholar google 了一下，这个缩写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心理学报之前发的文章也有这样的缩写，都没有关于工作场所的限定，若标题改变，这里应该更顺一些。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W ICTs 是“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的英文名称缩写。在修改版论文中，我们将“非工作时间和场所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处理工作”修改为“工作连通行为”，因此亦将 W ICTs 修改为 WCBA（“工作连通行为”的英文名称缩写），从而使论文的表述更加严谨和顺畅。

意见 3：

（1）正文的表述还要进一步优化，建议找更多的人帮助阅读“挑刺儿”。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我们（作者团队）在对论文进行了更加审慎的阅读之外，还邀请了三位不属于作者团队的老师和博士研究生对论文进行了“挑剔性”阅读，并对论文的表述不当之处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请参见论文中的[蓝色文字](#)。

（2）以引言第三段为例：“具体地，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员工的个体资源（非工作时间资源、心理资源）从而导致其个体资源短缺(非工作时间匮乏、工作压力)，个体资源短缺则会进一步导致员工无法有效地完成生活角色需求(工作-生活冲突)。基于此理论逻辑，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会通过员工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不同影响个体资源损耗过程；决定生活角色需求多少的

因素(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会通过员工生活角色需求的差异影响冲突形成过程....”这段文字中,“非工作时间资源、非工作时间匮乏”等表述有一些歧义,容易读成非工作时间(资源/匮乏),可以考虑将非工作时间挪到括号外,比如“具体而言,W ICTs 作为一种工作角色需求会损耗原本属于员工工作之外的生活资源(时间、心理资源)”...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我们认真考虑了编委老师的建议,但认为“将非工作时间挪到括号外”并不合适。具体地,“非工作时间资源”和“心理资源”分别属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个体资源”(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且“个体资源(Personal Resources)”在文献中属于相对固定的术语(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王震 等, 2021),因此“将非工作时间挪到括号外”进行相应的表述并不能恰当地表达本来的意思。但诚如编委老师所言,“非工作时间资源、非工作时间匮乏”等表述确实容易引起歧义。因此,我们将“非工作时间资源”修改为“**非工作时间**”,从而使其与“非工作时间匮乏”明确区别开来。具体修改请参见论文中的**蓝色文字**。

(3)“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的表述中,工作-生活冲突表现形式、W ICTs 使用工具、工作职位是否属于决定因素?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我们已将“决定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的因素”修改为“**与个体资源损耗效应相关的因素**”,从而使相关表述更加严谨。具体修改请参见论文中的**蓝色文字**。

(4)再比如 2.2 第一段中,“较为典型的测量有,Geurts 等人(2005)开发了包括时间和压力两种冲突表现形式的工作-生活冲突量表”。该表述中,“开发了”是否改为“开发的“更为合适?”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我们已在修改版论文中将“开发了”修改为“**开发的**”。具体修改请参见论文中的**蓝色文字**。

意见 4:“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第四轮)”中,审稿专家 2 的意见 3,建议继续优化。虽然作者也提供了文献,说明“当理论上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时可以采用“竞争性研究假设”作为呈现形式,否则需要使用“研究问题”作为呈现形式(例如, Liao et al., 2022)”。这样的表述方式总体还是不符合我们常规的阅读习惯,建议作者要么考虑用竞争性假设;要么说得更清楚一些,将在审稿意见回复中的文献引用到正文中,清晰地表述用研究问题替代假设的理由。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为了保证论文的严谨性,我们还是选择了使用“研究问题”的形式来呈现工作职位、性别和子女抚养状况的调节作用,并通过脚注的形式说明了为何使用“研究问题”作为调节作用的呈现形式。具体修改请参见**脚注 6**。

意见 5：需要增加结论的部分。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我们已在文末添加了研究结论的相关内容。具体修改请参见 [6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 ten Brummelhuis, L. L., & Bakker, A. B. (2012). A resource perspective on the work-home interface: The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7), 545-556.
- 龚朔, 李海, 夏铭, 朱金强. (2024). 有人喊你加班吗?主动性和反应性工作连通行为及其对情绪耗竭的差异性影响. *管理评论*, 36(2), 154-166.
- 马丽, 马可逸. (2021). 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倒 U 型关系——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软科学*, 35(2), 96-101.
- 聂琦, 张捷, 彭坚, 毕砚昭. (2021). 工作连通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多重任务倾向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4(2), 347-354.
- 王震, 陈子媚, 宋萌. (2021). 工作、家庭难兼顾?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11), 58-79.
- 袁硕, 唐贵瑶. (2018). 工作连通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40(9), 112-125.

第六轮

编委 2 意见：

还有一些小建议，建议修改。具体如下：

意见 1：虽然编委在上一轮建议作者“在不引起歧义的前提下，建议用前人已经用过、且简单的表述更为合理。”，但工作联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本身的翻译不够完整，读者理解起来未必那么直接，其缩写 WCBA 也没有那么广为流传。当然如果这个领域都用这个词，编委也理解。但建议作者再优化一下相关内容，尤其在摘要和结论部分，可以再表述得更为清晰一些。比如在摘要第一句，说清楚，“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变得***，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作联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WCBA)....”。再比如在结论中的第一句，直接讲 WCBA 替换成工作联通行为，不要用缩写了。这么建议的目的是：若读者只读摘要，或者只读结论，能够非常直观地知道作者在讲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1）当前中文文献对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的翻译主要有“工作连通行为”和“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两种表述形式，我们在论文中使用“工作连通行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若使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会使论文题目变得冗长并超过标题限定字数；第二，我们认为“连通”本身就包含了“非工作时间和场所”的意思，因此没有绝对的必要加上“非工作时间”这个前缀。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最终采用了“工作连通行为”这种表述形式，并使用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的缩写 WCBA 作为其简称。

（2）我们按照编委老师的意见分别对摘要和研究结论中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从而使读者只通过阅读摘要或研究结论便可以清楚地了解论文的核心内容。具体修改请参见摘要和 6 研究结论中的红色文字。

（3）我们还对引言中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从而使其更加简洁和清晰。具体修改请参见 1 引言中的红色文字。

第七轮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